

■ 新作聚焦

阿来非虚构作品《大河源》 一部黄河源的百科全书

□ 孟繁华

《大河源》是一部有深度、有难度的作品，也是多年来，我读到的最有力量 and 深度的非虚构作品之一。空间上它以黄河源为中心，时间上追溯到8000万年前草的出现，将黄河源的自然、历史、生物、考古、人文等各种景观尽收眼底，显示了阿来的知识修养、思想、眼界和文字能力。青年批评家赵坤说：“从文体上说，《大河源》并不独属于新文学以来的任何形式，在沟通古典传统的层面上，甚至也不局限在文学范畴之内。”这个判断是有历史感的。因此，这是一部走进黄河源深处的百科全书。黄河源是一个庞大的世界，如何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是非常困难的选择，阿来要写出的是黄河源的前世今生。它和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浅尝辄止、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指南”或风物奇观是不能来比较的。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强调经验对于创作的重要。直接经验来自作家对生活的直接感受，间接经验来自作家的知识积累。一个是见，一个是识。加起来就是见识。我们读一部作品、特别是非虚构作品，主要看的是作家的见识。



阿来的非虚构作品《大河源》走进了黄河源的深处，写出了黄河源的前世今生，展现了作家的深厚见识。作品体现出写作者的强大叙事能力，既总括黄河源的自然状况，又以小说笔法强化叙述的文学性；作品敢于反省人类行为，直面生态问题；作品在讲述神话传说历史的同时，兼顾硬核科学知识，称得上是一本关于黄河源的百科全书

强大的叙事能力与直面问题的勇气

阿来有着强大的叙事能力，作品开始就写自然状况的奇特，引人入胜。然后记述黄河源的“华夏之魂河源牛头碑”和那一刻的情感。措日杂则山、鄂灵湖畔、柏海往事、扎陵湖口、唐蕃古道等，都是自然景观。这些景观可能会有些变化，包括他们的海拔、地理地貌等。但看得多了，最大问题就是审美疲劳。我也曾到青藏高原走马观花，除了总体印象，我可能什么也说不出来。因此，叙事能力是一个作家的综合能力，也是最重要的基本功。这种叙事有小说的笔法，这种笔法强化了作品的文学性，使阅读成为一种“高级”的精神行为。学界经常讨论非虚构和虚构的关系。事实上，任何一种叙事都是虚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进入文本的记述，是作家选择的结果，选择就是虚构的一种方式。这和历史叙事是一个道理。《大河源》是平行的叙事视角，作家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这既是作家有意选择的方式，也是非虚构作品强调客观性决定的。

作品敢于面对问题。这是当前非虚构作品最缺乏的，普遍的颂歌是这个文体最大的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影响力那么大，最重要的是这个文体承载了巨大的社会历史问题，作家有使命感和担当。在《大河源》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诸多的问题和矛盾。比如“雁群与藏野驴”一节，“湖边的牧羊人看着那群藏野驴，却不似我们这些人是惊喜的目光。他们没有去打扰这群野生动物，但他们的目光里却有忧伤与迷茫”。这是生态保护与牧民生产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置身其间的人才会感到。野生动物比牛羊吃的草还多，不放牧牛羊了，草还是没有长起来。这样的看法往往是从文件和论文中难以看到的。

人的有限性与自然的无限性

写黄河源，不可避免要触及生态问题。以前大家没有写这些题材，一是还没有形成现代的环保意识，二是环境破坏也没有现在这样严重。工业化时代加速了对自然的破坏。学者赵汀阳说：“人对自然的影响已经达到了‘地质级别’，就是人的活动和能量已经改变了自然的性质。自然性质一旦被改变，就是灾难性的，会导致生态和环境的高风险危机。”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首次呼吁人类需要新的伦理：“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把已有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扩展到土壤、水、植

物和动物。也就是说，曾作为万物之灵降临世界的人，必须无条件地退回到与众生平等的位置，有意识地担当起生命共同体的公民角色，进而在彼此竞争与合作中获得可持续发展。李泽厚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较其他文化来说，在中国文化里，人的地位就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参天、地、赞化育”，甚至能够参与天的运作。他还谈到20世纪80年代有一些反传统学者的观点，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的缺点和问题，就是人的地位太高了。李泽厚表示，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为止，遵循的还是孔老夫子讲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在祭拜的时候就相信是有这个神明在的，不祭拜的时候也就不想这个问题了。到了现代语境下，文学助长了人对人本身的过高评价。譬如，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

在文学的语言中，人的“膨胀”似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现代工业化的急剧发展，使得人的资本欲望愈发高涨。诚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人对自身的过高估价，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终将自食恶果。因此，当我们在强调“文学是人学”的时候，首先要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强调人失去敬畏之心是多么的可怕。阿来的分析就承接了李泽厚的思路。这种理性分析所能达到的深度，在同类题材中称得上凤毛麟角。在这个意义上，阿来的《大河源》不仅具有文学性，同时具有学术性。对人的

反省，是《大河源》最有价值的问题意识。

神话传说与科学知识并重

神话与科学知识并重是作品的一大特点。神话传说大多是虚构的，科学知识是真理，本来有明确的界限。但顶尖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都对神话传说有着自己的理解。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还有更为极端的说法，即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在阿来这里，这个观念被他坚持实践着。他写到了神话传说，写到《格萨尔》这部神话史诗的传唱史，写到了遍地的经幡，而且强调“这部神话还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在藏地，神话已经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作用于现实生活。这一点，我们从阿来其他作品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比如《云中记》。祭师阿爸抚慰亡灵的行为和现实世界是有关系的。但作品中更多的是与科学有关的知识，比如冻土层、巴颜喀拉山的形成、草原退化溃败的主要原因，以及英国植物猎手威尔逊发现的那些植物等，还有关于卓何时在地球上出现等古生物知识，涉及到人类进化史、黄河源地区的发展史、建设史、治理史、各民族交往史以及文化多样性等。在《大河源》中，除了景物、自然描写外，作品中也有很多硬核的科学知识。只有深刻地认识科学，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神话；也只有深刻地认识神话，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科学。一如只有更深刻地了解过去，才会更清楚地看到现实是一样的道理。自然景观是黄河源的样貌，而人文历史和科学知识一起铸就了黄河源的“灵魂”。阿来就是这样，用文学的方式，复原了黄河源的样貌，赋予了黄河源的灵与魂。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 评论

熊焱在推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血路》7年后，又推出了长篇新作《白水谣》。《血路》故事背景设定于辛亥革命前夕著名的四川保路运动，事件很大，时间颇短，属历史小说。《白水谣》从清末1905年写到2016年，跨度百余年，讲述了白水镇杨家从老太太到杨平安共七代人被裹挟在时代大潮中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小说55万字，分上中下三部分，均为第一人称讲述：上部由第四代的杨浩(杨志强之子)，从新中国成立后讲到1966年；中部由第三代的王秀莲(杨志强之妻)接续上部讲述一小段后，陡转为一个漫长的回忆，从清末倒叙至起点再顺叙讲到改革开放前夕；下部为第六代的杨希望(作家、企业家，杨志强之曾孙)从1990年代起笔，至2016年收官。

《白水谣》是讲述百年家族史的长篇小说。这类小说的共通处，是对历史进程中的事件、人物等，用文学的办法解决史志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细节、温情和看不见的泪水。故此，对《白水谣》的比对、研究与评判，当可归入“百年家族史”一类小说的谱系中展开。《白水谣》的百年，是流水一般持续向前、激湍、再向前的百年——作者没有用断流的手法，跳开一些有叙事难度的特殊年代，以及特殊年代中的痛点和伤疤，而是流水般不落一滴娓娓道来。作者对各时代交接处节点的处理，几乎如流水自然而然。从头读到尾，我似乎只在傅秋红留信的落款处，看到了一个时间节点：2015年6月18日。流过空间的滚滚时间，不再是惯常的碎片化、截段式镜像，而是整体的无缝流布。

相比于同类小说，《白水谣》中杨氏家族的特点可用一个“大”、一个“小”来概括。所谓“大”，是指家族代际多、人丁多、生命样态多。杨家百年历史七代，全书所涉各色人等近百人，而各人有各人的人性善恶。这是一部包罗百年间世态万象的小说，悲痛与欢娱、穷困与富裕、爱情与仇恨、生存与死亡、成功与失败、理想与现实共存。作者想全方位地还原时间的真相。那么，问题来了：放弃主题、类型后，这部时间以百年为边界，空间以白水镇、建中县城和省城玉华为边界的小小说，其故事集群的游走边界在哪里？其实，就在55万字体量所辐射出来的小说艺术感染力、思想穿透力的阈值那里。

所谓“小”，指的是杨家出的人物小，数十号人中，没有一个科级以上官员，没有一位可以称为全县第一的名人。就是说，《白水谣》是一部纯粹的直面小人物、属于普通人生活的小说。没有大人物，也就意味着书中所有的大事件、每个人的命运，细理起来，理到源头，都不是家族中的个人掀起的和铸成的，而是由大时代的浪潮带来的，置身时代的大背景下，一切都显得渺小，唯有人性在映衬和挤压中得到反弹与膨胀——人物之小，导致了人性之大。

关于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熊焱在《白水谣》中所做的工作是力图让历史就是历史，从当代看过去是历史，让历史看过去也是历史——他的执念与自信，在不畏难度、不间断地呈现史实真相的文字表达过程中一览无余。所以说他自信，是因为他不是百年中一大段历史的在场者、见证人，却能胜任还原历史的工作。他是“80后”，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那些事，只能借助史料、采访和发挥才华及想象去走近。不过，作为“60后”的我是有发言权的。在此，必须说一句，他对那段历史的呈现是可信的，其把握的尺度也是到位的。穿行在时间丛林中，他尊重本来，诚实地写，写得让人如临其境，恍若亲历。

关于小说。写“百年家族史小说”，写好百年、家族和史，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落脚在写小说、写好小说上。所以，小说家要做的，是按照自己对小说设定的理想标准和严苛要求，把百年、家族和历史写“上道”——写到小说的道上来。显然，熊焱做到了这一点。粗略说来，我以为《白水谣》的一大特色是充分体现了当代性、诗性、可读性和纪实性。《白水谣》既忠实还原了历史，又让历史的曲折转圜、经验教训打磨出了时代的反思与深刻的思想性，以此实现了历史题材的当代性和当代价值——与当代紧扣的历史生发的小说烙印，像一丛野火、一盏马灯，照着来路，也照着去路。《白水谣》的诗性可以说无处不在，首先是它的小空间、大时代和众生生化出的开阔与气象，其次是对寓言和民间传说的借用，比如杨志飞、杨志强两兄弟有关死亡的先知先觉；第三是对描写对象在修辞学上所施加的诗化的唯美言路。至于可读性，《白水谣》不光是故事好看，也体现在语言、叙述、腔调、结构诸方面的赏心悦目上。

小说是虚构艺术，但虚构的《白水谣》，也是可以当非虚构来读的——不仅仅因为它实现了“艺术的真实”。需知，这个小说是有原型地和原型人物的。据作者介绍，他生长的地方叫白水村，小说中建中、玉华两个镇名，也是他贵州老家的两个镇名。他有个梦想，就是把自己那个百年发达过、大富过、做过、破落过、重生过的家族写出来，小说中的杨家就有作者家族的影子。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小说中众多熟悉又陌生、接了地气的小故事和小人物。

因于上述种种，我愿意把这部呈现多个时代大潮的好小说称为是“人性基本面的百年流水”。此处的流水，既为自然的流水，又为人为的流水。倘若想要了解底层人众在百年中国变迁中的人性长相与动态，《白水谣》就是一部流水，是一部一笔不漏、明明白白的流水。

(作者系成都市作协副主席)

如何实现历史叙事的当代价值

——读熊焱长篇小说新作《白水谣》

□ 凸凹



《白水谣》，熊焱著，花城出版社，2024年6月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西湖》《民族文学》《大家》：

文学中的女性流动意识与动态同盟

□ 王樱子

近年来，无论是文学写作、文化研究还是社会舆论场域，女性经验都受到广泛关注。在文学中，自我意识、性别差异、亲密关系等问题都有着高度凝练化和审美化的体现。《初步举证》《还有明天》《想飞的女孩》《好东西》等电影，也让越来越多的“她声音”被更多人聆听。在《西湖》《大家》《民族文学》等文学刊物的近期新作中，一系列颇具代表性的篇目既能反映历史中女性意识的一脉相承，亦能呈现当下女性生存境遇的微妙变迁。

女性意识的流动有时以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为契机，而展开自我反思。《西湖》2025年第1期中姚十一的《叮叮当当》就以生育主题展现了这种流动。女主角阿芝在去医院取节育环的过程中遇见了与自己母亲同名、同来取环的中年妇人金德善，在交流中，阿芝回顾了与母亲的故事、女人与生育的羁绊。而《西湖》2025年第2期中顾文艳的《BC.AD.》所呈现的反思则更为复杂幽微。女主角有着看似幸福的家庭：英俊有为的

丈夫江辰皓，漂亮可爱的女儿雪豹。某天，一个看似疯狂的女人尹欣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声称自己爱她的女儿、爱她的丈夫，并提议要和女主角“一起照顾雪豹”。在了解真相、经历种种复杂情绪后，再次遇见尹欣的女主角，竟然感到自己被看见、被理解，以致对和她的重逢如此盼望。《西湖》两期的新锐力作可谓形成了巧妙的呼应与对话，以“陌生人的介入”打开了女性意识涌动的闸门。发表于《民族文学》2025年第1期的《在奥德地区图书馆》，以“邮票”作为叙事的钥匙，打开了主人公对于父母爱情故事探索，描绘了女性的独特精神体验与哲思上的留白意蕴。酒二七的《稻墟》(《西湖》2025年第1期)通过农村女孩王前的坎坷经历，揭示了社会对于女性的职业偏见现象。同时，这种“女性意识”的流动并不只发生在女性个体身上。《民族文学》第1期中，郭乔的《梅花坞》展现了男性话语中的女性想象。由儿子吴大有转述的母亲“历史”，有着“被重写”的可能性；作

为一名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妇女，母亲所代表的女性形象所面临的困境往往是更为严酷痛苦的。她们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出色的表达能力，没有家庭奋力托举的个人发展平台，“自我意识的言说”对于她们似乎无从谈起，其处境是很难被看到、被听见的，甚至其形象也总是沉默的、低着头。在他者叙述中的女性，有多少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又有多少细节是凝视、虚构和想象出来的，是文学作品留待我们思考的空间。

文学作品中“女性同盟”的动态性也值得关注。陈书缘的《岸》(《西湖》2025年第1期)就描绘了一艘船长与全部船员均为女性的特殊船只，航海前众人寻找带有图书馆的目标岛屿，船在航行中陷入泥滩，几次遇险后完全偏离航线，眼看上岛无望，船员一片颓丧，在风暴中仅为生存而挣扎，最终被冲上了浅滩，却正是要寻找的岛屿所在地。故事带有强烈的女性同盟、寻找乌托邦、热爱智慧等隐喻。同时，

这种女性同盟不仅会以一个公共集体而存在，有时会广泛发生于女性个体之间。在女性成长的过程中，有时会存在着一个“女性偶像”式的人物，这个人物基本都是明艳、勇敢、有主见的，心智上更为早熟，往往也更叛逆。在《民族文学》第2期中，和晓梅的《花楼》中的女孩拉姆金之于“我”就是这样的存在。拉姆金在原生家庭中并没有受到过分压抑，她自由热烈地生长着，在外貌、体型、性格上的魅力可能就部分来源于家庭氛围的有爱与放松。《杀死一只天鹅》(《西湖》2025年第1期)的女主人公小静和大她16岁的语文老师马宁是忘年挚友，马宁因为姐姐去世受到心理创伤，两人通过“杀死天鹅”的方式彼此交流、理解、治愈，二人最终对杀戮的放弃，也表现了女性在反思后所选择的“放过自己”。辽京的作品《直到太阳落山》(《大家》2025年第1期)对于月季和冬冬这对姐妹之间的微妙情谊也有着细致的描写。冬冬对于更为聪明、冷静、早熟的月季有着仰慕和嫉妒，当她发

现自己比月季更快学会游泳时，她感到“很高兴，又有点不可置信”，反映了冬冬内心面对和自己极为亲密但又比自己更优秀的女性时，不由自主产生的自卑、嫉妒、竞争等幽微情绪。这类“双生花”式女性情感链接是动态的，不断的流转、事件的发生让女性之间的友谊不断被锤炼，因而它是稳固和深刻的，既可以是把酒言欢的肆意洒脱，也兼备精神世界浓度极高的双向理解与共鸣，女性在这种曲折而深度的交流中共同成长。

横向比较最近的《西湖》《大家》《民族文学》等数本优质刊物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流动在众多文学篇章被进行了更为深刻的书写，写作者、故事里的人、读者都在其间探索女性对自我、对外部世界、对亲密关系的认知与反思。这些文学作品中女性之间所构成的同盟，也往往是隐秘的、复杂的，过程漫长且富有动态性，最终却能历尽千帆，深入人心。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